

中国美术研究

Research of Chinese Fine Arts

■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 主编 吴为山 阮荣春 ■ 执行主编 阮荣春

第5辑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美术研究

第5辑

Research of Chinese Fine Arts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主编 吴为山 阮荣春

■执行主编 阮荣春

■副主编 顾平 郑工 牛克诚 汪小洋

编委会

主任：阮荣春

编委：刘伟冬 阮荣春 汪小洋 张晓凌

陈传席 陈池瑜 胡光华 贺西林

顾平 顾森 凌继尧 黄宗贤

黄厚明 黄惇 曹意强 樊波

薛永年

责任编委：朱亮亮 张南南

执行主编：阮荣春

副主编：顾平 郑工 牛克诚 汪小洋



东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南 京 · 2 0 1 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术研究. 第5辑 / 吴为山, 阮荣春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641-4382-4

I. ①中… II. ①吴… ②阮… III. ①美术—研究—中国②美术考古—研究—中国③美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J12 ②K879 ③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9424号

中国美术研究·第5辑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省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372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4382-4

定 价: 68.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 电话: 025-83791830。

吴为山，男，汉族，1962年1月生。具有国际影响的雕塑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学院院长，全国城雕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卢浮宫国际美术展金奖、英国皇家“攀格林奖”、首届中华艺文奖、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韩国仁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员，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曾任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终审评委。



吴为山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挖掘和精研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生命题，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雕塑创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创作了五百余件历史人物雕塑，被誉为“为时代造像者”，其作品目前遍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永久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及欧美重要博物馆。

吴为山教授首创中国现代写意雕塑之风，提出“写意雕塑论”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这是对中国雕塑优秀传统的全面总结，对中国雕塑当下创作的发展方向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



吴为山 空谷有音-老子出关 青铜 74cmx93cmx33cm

导读

进入癸巳蛇年,《中国美术研究》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联合编辑,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我们共同努力,加倍工作,希望新一辑的出版能够给广大专家、学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

我们立足于“美术考古”和“美术史研究”这两个特色栏目,征集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期提出创新性观点与热点。如李新伟先生和林少雄先生分别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及其他考古发掘信息,在文化思考层面分析原始艺术的精神内涵与意识特征;朱存明、刘纪和顾颖在汉画像石这一热点选题上进一步深入挖掘出了新的论点;何志国、张同标、刘慧、郭燕冰、于亮等学者就佛像的遗存考察、造像分析、图像流变、题材类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宗教题材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和难点,他们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美术史研究”中的论文既有偏重于考据的有关阎立本的祖籍世系考略、马和之活动年代及身份的相关考辨,又有关于陈烟桥、徐悲鸿等近代名家的美术活动探究,以及当代中国画变革道路的探析等,可谓资料翔实、涵盖广泛、论述充分,应当引起我们的研读。另外,还有关于女性艺术的现代性、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研究,也值得我们关注。

本辑的“艺术书评”选取了一中一西——于希宁、柯律格两位教授的新书书评,分别带我们领略画梅大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各自学术观点与艺术成就。

此外,我们还将定期推出在当代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家,以引发艺术界与收藏界的关注。“写意雕塑”的集大成者吴为山教授以自己独特的写意雕塑风格和诗意般的气质而引人注目。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始宇宙观		
——史前艺术与宗教权力关系的个案分析	李新伟	1
中国彩陶文化中的时空意识	林少雄	9
汉画像“九头人面兽”研究	朱存明 刘纪	18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汉晋佛像	何志国	24
青州背屏三尊像“倒龙”源于舍卫城大神变考论	张同标	36
键陀罗弥勒造像持瓶考	刘慧	44
论汉画像石的设计理念	顾颖	49
“十王”图像流变述略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绘画	郭燕冰	51
形制与图像：莫高窟第100窟设计思想探源	米德昉	61
克孜尔石窟佛传题材研究		
——中心柱窟因缘类佛传壁画题材的变化	于亮	66

【美术史研究】

唐代画家阎立本祖籍世系考略	赵文成	69
马和之活动年代及身份的相关考辨	黎晟	71
前哨的进行		
——陈烟桥早期木刻艺术活动研究	凌承纬 张帆	76
万古空山只月明		
——高奇峰的诗与画	王嘉	85
徐悲鸿的一九四九	华天雪	89
江河万派此昆仑		
——论郭风惠的书法艺术	梁鸿	101
探究中国画现代变革之路札记	舒士俊	107
“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		
——论绘画创作之“真”	李哲虎	114
女性艺术的现代性意义	徐琛	118
温情和敬意		
——国民素质与文化遗产保护	赵欣歌	122
古神庙戏台装饰艺术特征形成的文化因素探析	巩天峰	126

【艺术书评】

徒此挹清芬		
——序《于希宁艺术研究》	耿晶	132
柯律格教授的格物致知		
——《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	龚之允	134

【当代艺术家】

我看王朝闻先生的雕塑美学观	吴为山	136
---------------	-----	-----

【学术关注】

近期学术动态	朱亮亮 整理	145
--------	--------	-----

【封面赏析】

永远的情影		
——费成武《张倩英像》赏析		
	[英国]Joshua Gong	147

《中国美术研究》启事

1.《中国美术研究》由文化部主管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育部主管下的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联合创立。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专业科研单位所主编的专业学术研究系列，我们将本着学术至上的原则，精心策划艺术专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术新秀撰写稿件，立足于对中国美术学科开展全面研究，介绍最新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展示优秀艺术作品。

2. 本研究系列为每季1辑，自2006年9月创立以来，已经发行27辑，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12年起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3. 本研究系列设定主要栏目有：20世纪美术研究、艺术考古研究、宗教美术研究、艺术史研究、艺术市场研究、理论与批评、当代画坛名家、鉴定与收藏、艺术品拍卖等。竭诚欢迎投稿。投稿邮箱：38781388@qq.com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干训楼609室）

联系电话：021—52137074

邮编：200062

欢迎阁下赐稿！尊文如被采用，我们将略付稿酬。

《中国美术研究》编辑部

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始宇宙观

——史前艺术与宗教权力关系的个案分析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图1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龟

张光直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早期艺术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商周青铜艺术中动物纹样的分析,指出:“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独占这种沟通手段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1]他在后来对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至2300年)玉器的研究中,将艺术与巫觋及权力的讨论上溯到了中国的史前时代^[2]。

新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史前艺术与权力密切结合和相互促进的加速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300年之间。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

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獠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3]。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最新发掘出的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和陶器31件,绿松石器1件等,其中包括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4]。在辽西地区,本文将深入讨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维玉为葬”^[5]。在“中原地区”,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数量从仰韶早期的13处增加到19处,而聚落总面积则从44万平方米增加到近190万平方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19处聚落的面积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而小型遗址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

对铸鼎原地区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5次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使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详情。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建筑的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的房屋已经发掘: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南角的F106室内面积约

240平方米;东南角的F108室内面积160余平方米。三座房屋的门道均大体指向中心广场。据估计,建筑F105那样的大型房屋大概需要100个劳力工作3个月。特殊的位置、浩大的工程,都表明它们不是一般的居址,可能是公共活动场所,可能是特殊人物的“宫殿”,也可能二者兼备——无论如何,都可以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明确标志。

西坡墓地的发掘为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图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细节。已经发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但耐人寻味的是,差别似乎主要表现在墓葬的规模。最大的墓葬M27墓口面积达17平方米,在同时期墓葬中无出其右;该墓还全部以掺杂了各种植物枝叶的泥填埋,墓室上覆盖有木板和麻布;但随葬品相当简陋,唯一显示身份的是一对大口缸^[6]。

上述考古学材料清晰描绘出了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同步发展盛况。正如很多学者所言,各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各具特色,各地的社会上层表达等级、展示权力和威望的策略各不相同。玉器在长江下游和辽河下游的复杂社会中成为重要的权力标志物,本文拟以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分析为切入点,讨论在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初始阶段,艺术与权力的相互促进(图1)。

二

红山文化的核心地带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努鲁儿虎山一带。分布范围南抵小凌河流域,北至乌尔吉木伦河

作者简介:

李新伟,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主任,研究员。

研究方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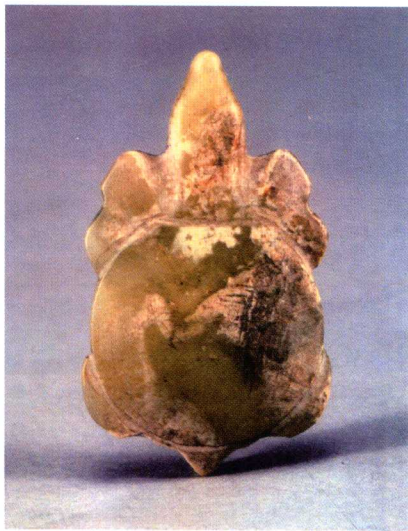


图2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龟

上游，西起西拉木沦河源头一带，东面已接近西辽河下游。大体包括今天的赤峰市全境、哲里木盟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东北的一部分。目前发表的红山文化碳十四数据有8个，年代在公元前4700至公元前2900年之间。参考其前后的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也参考与红山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我们认为红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200年左右。

自1935年赤峰红山遗址被发掘后的四十多年中，红山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强大的仰韶文化向四裔扩张的副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之后，辽西地区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被建立起来，红山文化达到的社会发展程度也震动了学界，长期被忽视的红山文化成了中国史前史研究、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最受瞩目的明星之一。考古学家们吃惊地认识到，以前被认为地处“偏远”的辽西地区在红山时期达到的社会发展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牛河梁礼仪性遗址群的发现。牛河梁属于辽西努鲁儿虎山脉中的一群漫长的山梁，它们位于辽宁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自西南向东北连绵相续，长约十多公里，因牝牛河源出山梁东麓而得名。在牛河梁一带，迄今已发现数十处红山文化晚期礼仪性遗址，它们的分布范围涉及3个乡镇的7个村庄，

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这些遗址往往地处某个山丘的顶端，彼此常能对峙相望，所以，它们中的多数应该互有联系，从而结成一个规模庞大的遗址群。这些遗址包括祭坛、积石冢、“女神庙”、祭祀平台等。积石冢下的社会上层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7]。

自1973年夏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的发现后^[8]，红山文化玉器逐渐被学者认识，并得到了广泛关注。牛河梁遗址群的大批玉器被发现后，更是引起研究热潮，相关的研究精彩纷呈^[9]。据统计，至2000年，在红山文化近30个遗址发掘和采集到的红山文化玉器共251件，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可靠的藏品有108件。表-1是主要玉器类型的数量统计。未计入的包括斧、镞、锥形器、玦、小管、珠等。

表-1 红山文化的主要玉器类型

猪龙	勾云形器	马蹄形器	鸮	镯	璧	勾形器	连璧	龟
49	38	36	27	26	23	11	10	3

对于红山玉器含义的推测是最容易引人遐想的话题，有关的论述也就最丰富多彩，歧见也最多。史前时代意识形态的分析本来就是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难题，按伦福儒的说法是件“危险”的事^[10]，很难说，但又不得不说，因为如果不触及意识形态，我们很难对史前社会有深入的理解^[11]。对红山文化玉器含义的讨论无疑是深入理解红山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各种对红山玉器的解释中，以原始宇宙观为着眼点，是一条值得探索的研究途径。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开拓性的论述^[12]，本文意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红山文化玉器反映的原始宇宙观，以及玉器与宇宙观产生联系的背景做进一步的讨论（图2）。

三

文献中对于先秦原始宇宙观的记载相当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项

基本内容：

天圆地方（《楚辞·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

天地间以维、柱相连（《楚辞·天问》：“斡维焉系？……八柱何当？”《淮南子·天文训》：“天柱折，地维绝。”）。

天体以天极为中心旋转（《楚辞·天问》：“天极焉加？”）。

龟为宇宙的天然模型，背象天，腹象地，足象连接天地的维、柱（《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一引《雒书》：“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疑缺‘平’字）法地。能见存亡，明于吉凶。”《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练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鸟可负星、日飞行（《楚辞·天问》：“羿焉弹日？鸟焉解羽？”）。

北斗为重要的星座，并与猪有某种关联（《大戴礼记·易本命》：“四主时，时主豕。”《春秋说题辞》：“斗星时散精为彘。”《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玉板、玉龟和双翅为猪首、胸负八角星纹玉鹰的发现^[13]说明这种原始宇宙观在距今5500年左右就已经存在，并被用玉这一特殊物质表现出来。正如作者讨论过的^[14]，玉版长方形的轮廓象方地，其中心刻画的两重圆圈象圜天，内八外四“箭标”形图案象维系天地的“维”，正中的八角星纹象极星。放置玉版的玉龟是宇宙的天然模型。对造型奇特的玉鹰比较融通的解释是在凌家滩人的宇宙观中，极星由神鸟承负，猪首代表北斗星，绕天极旋。

关于八角星纹与极星的关系前文只在注解中简述，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该图案目前所见最早的标本出自长江中游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大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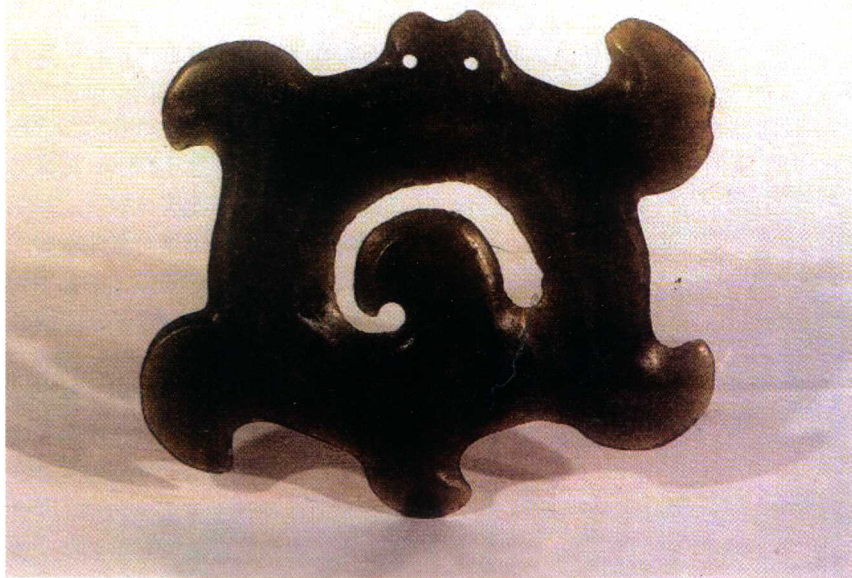


图3 天津博物馆藏红山文化龟形勾云形器

化早期的墓葬中（M1：1）^[15]，时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但其最流行的时期实际是凌家滩遗存所处的公元前3500年前后，流行区域为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与天文星象有关。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八角星纹代表太阳^[16]，但正如冯时先生辩驳的那样，当时对于太阳有更象形的表现^[17]。一个应该注意的现象是，大部分八角星纹都被刻画在圆形的中心，或在豆盘，或在使用时会旋转的纺轮，顺理成章的推测是，它代表的现实物也是处于圆心的位置，而且很可能是会旋转物体的圆心位置。在凌家滩玉版上，八角星纹正在代表圜天的双重圆圈中心，故此它最有可能代表的是圜天绕以旋转的极星。冯时先生认为此图案更有深意，暗含九宫观念，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鸟负日飞行的传说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史前时期的阳鸟负日图案也屡有发现^[18]。我国东部地区史前时期广泛存在的鸟崇拜应与鸟的这一特殊功能有关^[19]。鸟负极星的形象相对要少。除凌家滩的发现外，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墓葬出土一件宽把杯（IIM204：3），泥制黑陶，其宽把上部凸出，有二圆孔，发掘者认为表现的是简化兽面纹。实际上，整体上看，宽把更像是

简化的象形，凸出部分为眉和尖喙，圆孔为双目。在宽把中部，约相当于象的胸部，刻画一潦草图案，与八角星纹非常相似^[20]。可见，鸟不仅可以负日，还可以负极星。

总之，凌家滩玉器与文献对应符节，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充分说明先秦时期虽受问难却仍然流传的宇宙观至少可以追溯到凌家滩时期。

四

对牛河梁等遗址祭坛的研究显示，“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在红山文化中同样存在^[21]。红山玉器的内涵是否同样可以从原始宇宙观的角度得到恰当的解释呢？

正如作者讨论过的，引起广泛争议的红山文化重器——“勾云形器”主要有两大类：龟形器和象形器。龟形器是龟的，也就是宇宙模型的抽象表现。天津文化局藏品首尾、四足俱全，很多标本则只有与宇宙观最相关的身体和四足，省略头、尾。各龟形器“勾云”状的背部，意在表现天体的旋转。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见龟形器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品外，背部

的“勾云”均作顺时针旋转。特别是发掘出土的标本，如牛河梁第二地点I号冢M14：1^[22]，第五地点I号冢M1：4^[23]，第十六地点M2：1^[24]，及胡头沟遗址和那斯台遗址^[25]采集者均是，正与以地球为基点观察到的天体运行方向一致。这恐怕不是巧合，可以作为龟背像旋转天体的一条佐证。巴林右旗博物馆藏品形态比较特殊，上部有明确的双耳，形似象耳，似乎是一件将两种与宇宙观有重要关联的动物——象、龟合一的作品（图3.4）。

象形器中部为象面，着重刻画象的典型面部特征——圆目和弯眉，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其下部被很多学者认作牙齿的部分，也可理解为尾羽，与辽宁东山嘴遗址^[26]所出绿松石象（TC6②：1）翅羽和尾羽的表现方式一致。象形器两翼的上部以前没有好的解释，受凌家滩玉鹰的启发，我们认为至少在部分象形器上，该部分表现的是猪首。其中以弗利尔藏品最似（图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猪首占据两端的形式不仅在象形器上存在。东山嘴遗址所出玉璜（TE6②g1：1）整体呈弧形，两端为猪首。第十六地点M1：1玉梳背^[27]，高2.8厘米、长9.2厘米，中部为三连孔，两侧为猪首^[28]。另外，牛河梁第二地点I号冢M4墓主为成年男性，头向东，头枕一碧色玉箍形器，上腹部放置两件玉猪龙，一白一碧，背向摆放，白猪龙面南，碧猪龙面北。这是猪首占据两端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也说明猪龙这种红山文化典型玉器同样与北斗有关。诸种器物 and 遗迹现象相互印证，加强了红山存在与凌家滩类似的鸟负猪首形象、猪在红山人的宇宙观中同样与北斗有关这两个推断的可信性。

红山文化玉璧自具特色，多见外轮廓为方形形者，如牛河梁第五地点I号冢M1：1、2两件，放置在墓主头部两侧，颜色青碧，形状、大小相近（直径分别为12厘米和12.9厘米），上部均有两个细小的穿孔。而第十六地点M2：5颜色灰白，外轮廓呈圆角长方



图4 美国佛里尔美术馆藏红山文化桌面猪首玉勾云形器

形，长11.5厘米，上部有细小穿孔。穿孔有可能是供系佩用，可见璧正中的大圆孔不为实用，而是造型的需要。这类玉璧与凌家滩玉版相比，轮廓和规格一致，以中心圆孔代替了玉版上刻画的双重圆圈，并没有刻画箭标、八角星图案，似可看作是简化的玉版，暗含天圆地方观念。牛河梁第二地点I号冢M21：3是个体最小（长8.8厘米）的龟状勾云形器，中心部位即作外轮廓呈方圆形的璧状，可作此类璧与宇宙观关系的旁证。

泉、龟这两种与原始宇宙观密切相关的动物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表现内容。由目前的发现看，泉的数量要远多于龟。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中与原始宇宙观有关者大致包括：勾云形器（含龟形和泉形）、猪龙、璧和肖形的泉、龟等，其数量约可占目前所见红山玉器总数之半（据注2a统计），构成了红山玉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像凌家滩玉器一样，红山玉器也蕴含着原始宇宙观的诸项基本内容（图5）。

五

玉器在辽西地区源远流长，可以认为辽西是中国史前灿烂玉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29]。但兴隆洼文化玉器虽已发现有50余件，种类只有小件装饰品块、管、弯条形器，以及小件仿工具匕形器、斧、镑、凿等^[30]。见于报道的赵宝沟文化玉器甚少。红山时期玉器何以突然繁荣，并被用于表达宇宙观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先要探讨一下宇宙观为何在红山时期成为宗教观念的核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依托，经济形态在红山时期发生的变化，是促成意识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

关于辽西地区的经济形态，是一个颇多争论的问题，或以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以狩猎采集经济

为主，红山文化时期才真正出现了农业^[31]；或以为自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农业经济^[32]。以前论者判断是否有农业经济时比较依赖对石器等功能分析^[33]，难以获得最直接的证据。近年由于兴隆沟遗址发掘中的出色工作，辽西地区农业起源问题有了重要突破^[34]。通过全面的浮选，在该遗址土样中获得了驯化粟的炭化颗粒数十粒，驯化黍的炭化颗粒千余粒，首次确认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作物^[35]。但这些炭化颗粒都出自个别单位采集的土样中，亦即它们在遗址中并没有广泛的分布，这种情况通常被视为表明农作物在食物中所占比例很小^[36]。换言之，兴隆沟居民不是依靠粟和黍生存的农业居民，狩猎和采集仍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来源，黍、粟种植只是为弥补特殊情况下的食物不足，增强定居生活保险系数。这一重要发现又一次说明农业起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37]，农作物栽培和农业——即栽培收获农作物成为获取食物的最重要方式——不是一回事，这将引发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起源的深入思考。赵宝沟文化的工具系统、聚落数量和形态与兴隆洼时期相似，经济形态也应该相似^[38]。

虽然缺乏像兴隆洼文化时期那样直接的证据，仅由聚落规模和形态



图5 凌家滩遗址出土双翅有猪首的玉鹰

看,红山文化无疑是辽西地区农业真正确立的时期。系统的聚落调查显示,红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和总面积剧烈增长。在作者进行的内蒙古敖汉旗蚌埠下游的拉网式考古调查中,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为5处和6处,而红山文化时期为23处。而遗址总面积的增长更显著,三个时期分别为3.76万、6.55万和75.4万平方米^[39]。20世纪80年代敖汉旗全境内的文物普查中,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遗址各有几十处,而红山文化遗址多达500余处^[40]。在中美联合进行的半支箭河流域拉网式考古调查中,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为17处和29处,红山文化时期为160处^[41]。红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和总面积的增长,表明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食物保障,这种惊人的增长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红山文化时期虽然不是最初栽培农作物的时期,红山社会却是辽西地区最早的农业社会。

农业生活的确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农业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食物资源,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关系^[42]。本文难以对农业造成的改变全面讨论,只想说明农业与宇宙观的关系。比起狩猎和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对于天体运行知识无疑更加重视。在很可能缺乏精密历法的情况下,天体运行是原始农民安排农事最主要的参照。掌握天体运行知识,对农业生产的丰欠至关重要。红山社会上层阶级自然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天体运行知识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深知,在农业社会中,最好的获得权威的方式就是创造一种以宇宙观为基础的宗教体系,再通过控制这个体系,控制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这就是红山时期宇宙观成为宗教体系核心的背景。

前国家复杂社会上层阶级的“领导策略”(leadership strategies)是目前西方研究复杂社会的重要课题^[43]。研究酋邦社会(chiefdom)的领军人物之一艾尔(Timothy K. Earle)将众多

领导策略分为三大类:经济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44]。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类的领导策略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在对中美洲^[45]和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46]酋邦社会的研究中,学者们指出意识形态的力量在酋邦社会的形成和运转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红山文化中像牛河梁那样与世隔绝的“宗教圣地”的存在^[47],以及高等级墓葬中“唯玉为葬”的习俗^[48]充分显示意识形态,或者说与宇宙观密切相关的宗教体系在红山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六

这种新的宗教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艾尔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是上层阶级“创造”(create)出来用以维护其权力的^[49]。红山时期与宇宙观密切相关的宗教体系也应是红山社会上层阶级的创造。当然这种创造首先是在继承辽西地区宗教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学者曾深入探讨过红山玉器与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时期宗教因素的联系^[50],红山时期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元素确实早已存在于辽西。

猪崇拜自兴隆洼文化时期即已开始。兴隆洼遗址房屋居住面上多见摆放额头有穿孔的猪首的现象,居室葬M118为人猪合葬^[51]。近年发掘的兴隆沟遗址中,H35坑底部中部相对放置2个猪首,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躯体。东侧的猪首较完整,额顶正中有一圆孔,躯体呈“S”形^[52]。赵宝沟文化时期,小山遗址出土尊形器上有猪首形象,猪身为抽象的弯曲造型^[53]。这些都可看作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形。但正如有学者论述的,猪崇拜在前红山时期更可能与以狩猎采集为主体的经济形态有关,未必有宇宙观的内涵^[54]。

鸟的形象在兴隆洼文化时期也已经出现,赤峰各地博物馆中收有不少形似鸟的小件采集品。兴隆洼和兴

隆洼沟遗址简报中发表的被称为“人面”的石制、蚌制饰品,多有尖圆的下颌,称为“桌面”好像更贴切些。赵宝沟文化时期鸟的形象仍以小山尊形器上的图案最具特征,颈较长,长钩喙,圆目,有冠,翅膀以三片翅羽表示,似鹰类,与鸟有区别。最近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中出土玉鸟一件,放置于墓主人头顶,青色,长达19.5厘米,与小山尊形器上的鸟有不少相似处,也有较长的颈部,长喙略钩,圆目,有冠,翅膀以三片翅羽表示,虽然小山尊形器鸟作展翅奋飞状,M4鸟作回首静卧状,两者的关系还是一目了然的。如上所述,红山文化时期还是以鸟的形象最流行。鸟的形象虽早已出现,但目前还难以说明前红山时期鸟就成为原始宇宙观中的要素之一。有学者曾讨论过小山尊形器上的图案与星象的关系^[55],这还需要更多的发现来证明。

简言之,到红山文化时期,这些传统因素才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新的以原始宇宙观为核心的红山宗教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改造传统因素,红山社会上层在“创造”其宗教体系时还引进了外来因素。龟崇拜约始于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多见随葬龟甲的现象^[56]。其后逐渐流行开来,成为江淮地区重要的文化因素^[57]。但前红山文化时期,龟的形象在辽西地区很少见,目前仅在地处燕山南麓的上宅遗址中发现石龟一件,似为龟崇拜的北界^[58]。红山文化中的龟状勾云形器和小玉龟很可能是引入南方观念的产物。

在继承和引进之外,红山社会上层还有自己的真正创造。红山玉器的主要类型如勾云形器、猪龙等形制独特,充满创意,奠定了红山文化玉礼器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总之,在农业成为生存基础的背景下,通过继承、引进和独创,红山社会上层创造了新的以原始宇宙观为核心的宗教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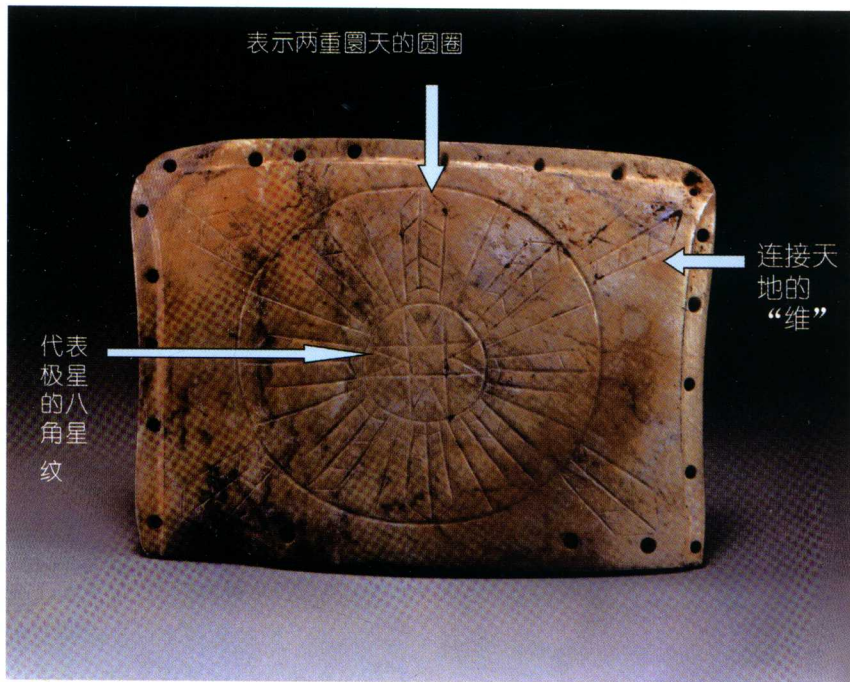


图6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

七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为什么玉器在红山时期被用来表达原始宇宙观、玉器艺术品为什么成为宗教权力的标志物。

艾尔认为，抽象的意识形态要被“物化”（materialization）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才能发挥其功能，物化的形式大体有三种——举行公共仪式（Public ceremonial events）、建设公共建筑和人工建筑与自然地貌结合的人文景观（Public monuments and landscapes）和制作符号性物品（Symbolic objects）^[59]。为了发挥新宗教体系的功能，红山社会上层利用了全部三种物化方式。牛河梁遗址群是明确的宗教性建筑群，各类建筑与自然地貌结合，又共同构成了对红山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人文景观^[60]。虽然现有的考古资料不能为我们提供详情，可以想象有很多宗教仪式会在坛、冢、庙和第一号地点“女神庙”北部的大平台上举行。

玉器在红山社会是最重要的符号性物品，用玉器表现宇宙观同样是红山社会上层物化新宗教系统的重要手段。艾尔认为制作符号性物品是最有效的

物化意识形态的方式之一。比起其他两种物化形式，符号性物品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的特点。这使得它们成为显示个人地位，标志阶层身份的最佳标识物；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社会集团进行意识形态交流时的最重要媒介，具有意识形态领域“货币”的功能。承载着宇宙观信息的红山玉器标志着佩戴者具有宇宙知识和通天技能，在宇宙知识和通天技能占有特殊地位的红山农业社会中，自然也标志着宗教和社会权威。维护对玉器的控制，是红山玉器的拥有者，也就是被安葬在积石冢下的红山社会上层控制整个红山社会的重要手段。

如艾尔所总结，对符号性物品的控制有两个途径：控制原料和控制制作技术。

红山玉器的原料产地还是有待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目前多认为红山玉料出自辽宁岫岩玉矿^[61]，距离牛河梁遗址群的直线距离约300公里，同时也不排除源自其他产地的可能性^[62]。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玉料在当时肯定是稀有而难以获得的，因而就更容易被某一社会集体控制。红山玉器虽然没有如良渚玉器那样的精细雕刻，但同样需要高超的制作技术。牛河梁第

2地点I号冢M27出土的勾云形器长28.6厘米，从质地脆硬的玉料上切割出如此大而薄的玉片需要很高的工艺水平。同冢下M4出土的箍形器高18.6厘米，厚度为0.7到0.3厘米，取芯成器也不是轻易能完成的。毫无疑问，红山玉器是掌握了专业技能的特殊人员制作的。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乡大孤翅遗址、丰收乡骆驼营子遗址^[63]和荷也乌苏乡董家营子遗址^[64]都发现有玉器坯料如箍形器内芯。这表明大型红山遗址中可能有玉器作坊。但因为缺乏系统发掘，目前难以探讨红山玉器制造者的具体身份。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按照比较传统的观点，手工业产品的制造者并不是使用者^[65]，即红山玉器是由红山社会上层控制的专业生产者制作的。第二种可能是红山社会上层人员自己制作了这些精美又神圣的玉器。有些西方学者指出，在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知识和技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之也就有特别的排他性，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用品很可能由宗教信仰的控制者自己制作^[66]。有学者根据凌家滩遗址及良渚和齐家文化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玉料的现象推测，中国史前时代的精美玉器有可能是使用玉器的社会上层人员亲自制作的^[67]。红山文化中是否如此呢？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总之，玉器的便携性、玉料的珍稀性、玉器加工工艺的尖端性，都使得玉器成为社会上层展示和控制宗教权力的最佳媒介。以玉器这种原料稀有、加工复杂的美润材质“物化”宇宙观，并将其作为沟通天地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红山社会上层有效控制天体运行知识和沟通天地手段，并进而控制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运转的有力“领导策略”。社会上层控制宗教权力的野心促进了玉器工艺的发展，艺术与权力在中国史前社会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期相得益彰，这一相互作用模式对后代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图6）。

注释:

- [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 [2]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1页。
- [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 [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 [5]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文物出版社,2012年。
- [8]方殿春、李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4期,第1-5页。
- [9]a. 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二),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4-83页。
- b. 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0-210页。
- [10]Renfrew, C. (1994b). Towards a cognitive archaeology. The ancient mind: Elements of cognitive archaeology. E. B. W. Zubr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2.
- [11]Hodder, I. (1992).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1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13]a.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第1-9页。
- b.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第1-12页。
- [14]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第66-72页。
- [1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第341-353页。
- [16]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 [17]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3-385页。
- [18]a.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4-149页。
- b. 王宇功.《考古所见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9-44页。
- [19]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4页。
- [20]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 [21]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43-355页。
- [2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第1-17页。
- [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第4-8页。
- [24]李公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第497-510页。
- [25]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第507-518页。
- [26]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11页。
- [27]杨晶.《史前时期的梳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第31-39页。
- [2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文化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 [29]刘国祥.《论西辽河流域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306页。
- [30]刘国祥.《兴隆洼文化玉器初论》,《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6-180页。
- [31]刘国祥.《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7-96页。
- [32]刘晋祥、董新林.《浅论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经济》,《考古》1996年第2期,第61-65页。
- [33]王小庆.《石器使用痕迹显微观察的研究——以距今8200—6500年前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中心》,未发表博士后报告,2002年。
-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 [35]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74页。
- [36]承蒙赵治军先生告知,深表感谢。
- [37]Zhao Zhijun 1998.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 northern Jiangxi. Antiquity 72: 885-97.
- [38]刘国祥.《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7-96页。
-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待刊。
- [40]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7-102页。
- [41]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 [42]Cohen, D. J. (2002).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 Origins of Pottery and Agriculture. Y. Yoshinori. New Delhi, Lustre Press: 217-230.
- [43]Earle, T. K. (1991).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s.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T. K. Ear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5.
- [44]Earle, T. K. (1997).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7.
- [45]Steenonaitis, V. P. (1991). Contrasting patterns of Mississippian development.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T. K. Ear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28.

[46]Feinman, G. M. (1991). Demography, surplus, and inequality: early political formations in highland Mesoamerica.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T. K. Ear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9-261.

[47]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

[48]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第20-26页。

[49]Earle, T. K. (1997).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49.

[50]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考古》1998年第5期,第65-79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第1-26页。

[52]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74页。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第481-506页。

[54]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考古》1998年第5期,第65-79页。

[55]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6-116页。

[5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57]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7-70页。

[58]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第1-8,16页。

[59]Earle, T. K. (1997).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1-159.

[60]Barnes, G. L. and Guo Dashun (1996). "The ritual landscape of 'Boar Mountain' Basin: the Niuheliang site complex of north-eastern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28: 209-219.

[61]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雕刻史》,《中国美术全集》第九卷,中国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62]Wen, Guang and Jing Zhichun (1996). "Minera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archaic jade." Acta Geologica Taiwanica 32: 55-83.

[63]邵国田.《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70-71页。

[64]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7-102页。

[65]Costin, C. L. (1991). Craft specialization: Issues in defining, documenting, and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M. B. Schiffer.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3: 1-56.

[66]Spielmann, K. (1998). Ritual craft specialists in middle range societies. Craft and Social Identity,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 L. Costin and R. P. Wright. Arl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8: 153-160.

[67]Liu, Li (2003). "The products of minds as well as of hands": Production of prestige goods in the Neolithic and early state periods of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42(1): 1-40.

(上接第48页)

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 of the Kushans".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1967; 231.

[20][日]高田修:《佛像的起源》[M],日本:岩波书店,1967:328、334.中文译本由高桥宣治、杨美莉译出,载《世界佛学名著译丛89、90——佛像的起源(上)(下)》,台湾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

[21]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M],台湾台北:觉风佛教文化基金会,2000。

[22]此说较早由A.Grunwedel提出,参见A.Grunwedel-J.Burgess: "Buddhist Art in India", London, 1901: 188. A.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Tome II, Paris, 1918: 224.

[23][日]石松日奈子:《中国交脚菩萨像考》[J],《佛教艺术》178号,日本:每日新闻社:64-66。

[24]瓶肩指瓶颈至瓶底中间最宽部位。

[25]A. Griinwedel, Buddhist art in India, London, 1901, P. 186, Fig. 132.

[26]A.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que du Candara, Tome 2, Paris, 1918.

[27]J. Mars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London, 1960, P. 103.

[28]H. Ingholt,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New York, P. 135.

[29]J. M. Rosenfield, P. 231.

[30]A.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que du Candara, Tome II, Paris, 1918, P. 218.

[31]上原和的“弥勒菩萨像的姿势—交脚形与半跏思维形”的讲演于1983年3月在汉城举行的第二次韩日联合古代史学术讨论会。复次发表于1984年秋天福冈举行的美学学会第35届全国大会。

[32][日]上原和著/蔡伟堂译《犍陀罗弥勒菩萨像的几个问题》[J],《敦煌研究》,1994-3: 62-70。

[33]http://www2.ocn.ne.jp/~greekart/vase/s_oil_j.html

[34][日]官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41。

[35]M. A. R. Colledge, The Art of Palmyra, London, 1976, pp. 40-41, Fig. 21.

我们在探究华夏审美意识的发生时,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族类而非个体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和萌芽,有什么外在的表征或明显的标志。这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困难的课题,一方面因为时代久远,史前社会保留下来的东西甚为稀少,即使一些发掘出的遗物,也因已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失去了其自身的“所指”;另一方面,由于原始审美观是处于人类童年时的观念,所以和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观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既无法去还原史前人们观念的本来面目,又不能以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去先验地规范当时人们的观念,这种矛盾使我们对原始文化的探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挑战性和潜在的危险性。我们既不能套用自己现有的知识,又无法超越自身现有的知识结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将自己置于了危境。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我们认为是对审美范畴的探讨,也就是说,审美意识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一定审美范畴的确立。因此,如果要对史前人类的审美意识有一定的了解,就必须避免抽象的议论,而从具体的一些“元范畴”入手,探寻史前人们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当然,对于史前人类来说,虽然不可能对其进行明晰的分析和明确的界定,但这些范畴自身却有着约定俗成的稳定性与流布久远的广泛性,所以我们试图选取一些在当时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和具体的概念

进行分析,以期对原始审美意识和观念的发生有一个较为翔实的了解。这些范畴除了“土”、“水”、“火”等“元崇拜”范畴外,还有“时”、“空”、“高”、“深”等。

天圆地方

任何一种史前文明对世界的关注,莫不以时间与空间为其重要对象。史前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与感悟,首先表现在宇宙创世神话中,或者说所有关于宇宙创世的神话,都是关于史前人们对时间和空间定性定位的神话。中国创世神话亦复如是: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1]

在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时间总是有一个“起点”,这就是世界的开始;空间也有一个形成表征,即天地的开辟。在此之前是一片混沌,时间和空间皆不存在。天地开辟的神话,与其说是事物起源的神话,还不如说是时间和空间起源的故事。只有时间和空间开始,才为人类生物的活动与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背景和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所以一切天地开辟神话,与其说是幻想中虚构的产物,毋宁说是原始人渴望理解和把握时间与空间、渴望建立整个世界时空秩序的意识 and 心理这一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创世神话,其深层原因都是力图寻求建立一套时空系统的努力。

作为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类一开始就对自己无法超越的时间和空间充满了普遍兴趣和广泛关注,这种现象不仅源于人类天性中的好奇心,也不仅是人类理性的需要,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一种生理本能,也就是说人无论是在其生理上,还是在内在心理上,都有一种自然的对时间与空间的感受能力,其中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时间的流逝。这一点德国学者卡西尔曾有过较为精辟的论述:

对于神话意识和情感来说,一种生物学时间、生命的有节律的涨落和流动,先于对严格宇宙时间的直观。实际上,神话首先是以这种特殊的生物形式理解宇宙时间本身,因为自然过程的规则性,行星和季节的周期性对神话意识完全呈现为一种生命进程。起初,神话意识理解日夜更迭、植物的花开花谢和季节的循环秩序,其途径只是把这些现象投射到人的存在上,就像在镜子中一样领悟这些现象。这种交互关系产生出神话式的时间感受,这种感受在人生的主观形式与自然的客观直观之间架起一座桥。……原始神话的“阶段意识”(sense of phases)只能借助对生命的印象领悟时间,因而它必须把随时间运动,以固定节律生生灭灭的万事万物,都转换和化解为生命的形式。^[2]

作者简介:

林少雄(1962—),甘肃陇西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艺术史与艺术批评、视觉认知与文化、纪录片。

由此可见,人类最初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首先是受到生物学节律的支配,也就是说,人类感受和理解时空的意识,是属于人体生理所特有的一种生物性的本能自觉。人类生存于具体的时空关系中,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证明,而内在生命的节律,又时时提醒人们去把握和理解这种关系,所以对于时空的把握,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性的本能。正因为如此,在最原初的阶段,人类的时空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意识。

一般而言,时间感觉是与周期性的或节奏性的重复过程有密切联系的。对于时间的度量,一般是以呼吸或心搏为基础的。但在我们的躯体内进行着许多的我们不甚明白或不自知的过程,运动,呼吸,心律、脑波、注意力的强度、情绪与有机体消耗,它们对时间、节奏或节拍有着特殊的感受。但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倾听,就总会有时间感觉。生理过程的时间性应当是我们优先考虑到的。时间的这种特性,使得人们对其理解和把握,总是与自身的生理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生理因素,起初主要表现为人体生命的一种节律,它也是人类对时间进行把握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人类最早的空间观念,包含了观念空间和生活空间两部分,而人所构建的空间,既是观念空间的具象显现,又是生活空间的实际需要。生活空间是观念空间的具象释示,或者说它的出现表明了人对观念空间的具体界定和把握。人们一方面生活在具体的空间环境中,是一种特定空间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这特定的空间环境中,人又时时地在思考着空间的性质,感悟着空间的存在,这样必然地会产生关于空间的具象体察和抽象感悟的意识,这两种意识不断地交融和重叠,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就形成了人们关于空间的最初观念。

人类对空间的感受,除了广渺无边的自然宇宙空间外,首先要设定一个个人的感觉空间(或者说参照

空间),亦即要在自然大空间中划分出一个人小空间。人类对大空间的认知与把握,也往往是通过小空间的设定来获得的,“上下四方曰宇”,“宇”是空间,但对其把握却是通过“上下四方”这一设定空间作为参照系的。由此可见,个人对空间的观念,先验地存在于人对自然空间的把握之前,因为真正的纯属自然性的大空间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既不能触摸、又无法视听,故在对空间把握的始初,人们或者以一种可感觉的形式替代之,或者先设定一个参照系。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亦可作如是观。

时间是无形的,人类要很好地把握时间,就必须将其赋予一定的形状,所以时间的意象,也就随着人们赋予它的形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时间的意象,一般总是与人们视觉上的形象或者大自然中存在的事物发生联系,这其中流水成为重要的时间意象和外在表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感叹之所以对后代文化中人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影响巨大,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很大程度上它表达了人类原初对不可把握的时间意象具象化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形成的将时间与流水相等同的心理积淀。流水的不息与时间的无法回复的单向性运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异质同构关系,而静止的潭水、婉转的小溪、奔腾的巨流,与人们对时间或静止、或回环、或飞逝的主观感受又形成了一致的对应关系。

此外,时间还与自然界其他事物有着密切关系,如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而形成的白昼和黑夜的交替,都是促使人类把握时间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史前人类来说,由于其意识处于相对早期的萌芽阶段,同时其日常生活深深地受到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加之时间和空间在人们的意识中总是有着那样多的相似性,有着那样紧密的联系,因此人们在体悟和思考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与观念时,不可能将两者截然分离,而是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间通过空间

而得以明晰、空间通过时间而得以显现,对于时间的具象把握方式,与空间意识和观念紧密相连,于是在史前先民们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意识是如何通过对空间意象的体悟来得到不断强化的,无论是河水在大地上的流动,还是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这些流动和运行,都莫不以其空间位置的移动为其外在表征,这样,在人类最初的时间意识中,自然地又引入了空间意识。时间的变化以空间的变化为表征,空间的位移又成为时间的象征,于是,在人类最初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中,两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参照的关系,所以在史前人类那里,一方面通过空间来把握时间,另一方面,又通过时间来把握空间。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既不存在脱离空间的时间,也不存在脱离时间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古代人们时空意识的萌芽,典型、集中地表现在其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天圆地方”观念。

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也许源于制陶的工艺和过程,因为天地有盖子的联想,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完全源自制陶的灵感,或者说“天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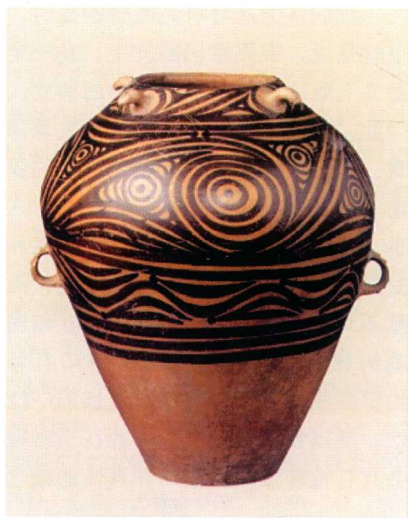


图1 流水的意向,一直是中国古代人们表达自己对时间的颖悟与把握的具象载体,这一点在彩陶纹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的一组图像,将人们对水的感知表现得淋漓尽致



图2 史前人们对水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今天陕西与甘肃交界处的陇东地区的民间香包中，仍然保持了这种鲜活的记忆

方”的宇宙结构论，取象于陶器特有的形状。《礼记·郊特牲》：“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观念：首先，陶器乃天地之特质的具象表现，即它反映了天地的一种本质的东西；其次，陶器“以象天地之性”，说明陶器的起源观念、外形塑造、花样纹饰中皆含有古人的宇宙观，具体表现为一种时空意识。

具体地表现古代人们关于宇宙构造学说的理论，便是“盖天说”和“浑天说”，两者皆取象于陶器的制

作与外形，或者说与陶器的制作工艺及其外形有着密切关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先民们，莫不时时地力图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其中关于宇宙构造的学说，可以说凝聚了原始人所有的感悟、猜测、经验与幻想。在所有关于宇宙构造学说中，“盖天说”可以说是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然而考其文化渊源，则与陶器的关系十分密切。“盖天说”的“盖”，是覆盖、罩盖之意。《说文》中作“蓋”：“蓋，苫也。”该字从“皿”，即覆盖于器物之上，且《尔雅》将其归入“释器”条，可见其当初与器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盖”的一个重要义端，即指器物上部有遮蔽作用的东西，这当为“盖”字之本义，大约是指制作好后待烧的陶坯，为防止雨水的浸泡和日光的暴晒，需要先苫上草编的东西，待荫干后再进行烧制（这种方法在陶器的烧制过程中至今仍然在采用）。可见“盖天说”的“盖”字，其本义取自与陶器制作密切相关的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

陶器时代人们的时空观，还与当时人们对天体宇宙的观察有着密切关系。在史前时代，人们头顶上那一片纯净碧蓝、幽远深邃的天空，不可能不引起先民们浓厚的兴趣和长久的关注，这不仅源于人们天生的好奇心，更主要的是它与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当是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墓葬。墓坑平面南部为圆形，北部为方形，墓主为一壮年男性，头朝南，脚向北。骨架两侧分别有两只用蚌壳堆塑的龙与虎，龙东侧弧形龕内陪葬一男童，虎西侧弧形龕内陪葬一女童；墓主脚下两根胫骨和一堆三角形蚌壳。据考证年代距今约6500年左右。据冯时先生研究，墓坑南边呈三曲弓形穹窿状，是圆形天穹的形象模拟；东西两侧的南半段，各作弧形向外凸起，表示东方天与西方天的弧面；东西两侧的北半段与墓室北边呈方形相接，表示方形的大地。整个墓室是按照和模拟“天圆地方”的“盖天说”的宇宙论布置的。墓主脚下相当于墓室中央，两根胫骨成柄形同三角形蚌塑相接，形似尖底葫芦瓢，表示北斗七星的“斗”。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幅以“盖天说”为理论基础的完整的天象图^[3]。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时空观，与人们对天体宇宙的观察以及建立在这种观察之上的想象的构建有着密切关系。

居高处深

史前人们对于空间的把握，主要是通过“高”和“深”的体悟来实现的。其实，对于“高”、“深”的把握与体悟，不仅构成了史前人类对



图3 一组与陶器大致同一时代的玉琮，成为外圆内方、天圆地方观念的具象释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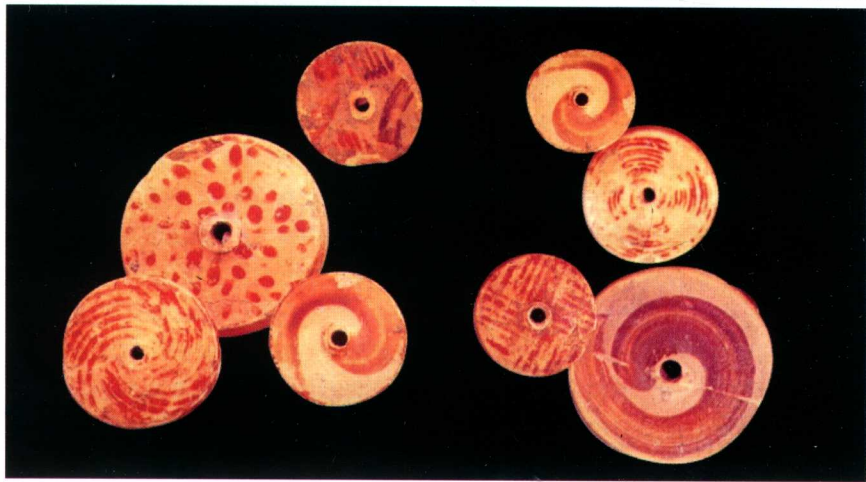


图4 彩陶中的各种圆形器物与图案，表明对圆的执着